项怀诚 主 编
贾 康 副主编

中国财政通史

春秋战国、秦汉卷

黄文模 李洪波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三编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猿）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局势及其发展变化……（猿）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远）
本章小结 ……（员园）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财政改革……（员猿）
第一节　春秋时期各国的财政改革……（员源）
第二节　战国时期各国的财政改革……（员怨）
本章小结 ……（圆怨）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制度与财政管理……（猿园）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收入……（猿园）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支出……（猿愿）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管理……（源缘）
本章小结 ……（缘园）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思想……（缘愿）
第一节　管仲的财政思想……（缘愿）
第二节　商鞅的财政思想……（远源）
第三节　子产、范蠡、计然的理财思想与主张……（苑园）
第四节　孔子、李悝、孟子的理财思想与主张……（苑员）
第五节　荀卿、韩非的理财思想与主张……（苑缘）
本章小结 ……（愿园）

第四编　秦汉时期的财政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概况 …… （略）
　第一节　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略）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二章　秦王朝统一财政制度的建立 …… （略）
　第一节　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若干重大财政改革新举措 …… （略）
　第二节　秦代财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三章　秦朝速亡的财政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 （略）
　第一节　秦始皇及二世的残暴统治 …… （略）
　第二节　秦朝速亡的财政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四章　西汉初期封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政策 …… （略）
　第一节　汉初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重建与变革 …… （略）
　第二节　汉初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其社会效果 …… （略）
　第三节　汉初的财政紧缩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五章　汉武帝时代财政改革的新举措 …… （略）
　第一节　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几项重大举措 …… （略）
　第二节　西汉盛世财政危机加剧的真正原因 …… （略）
　第三节　武帝时代以财政为中心的社会综合改革新举措 …… （略）
　第四节　武帝时代财政改革的社会效果 …… （略）
　第五节　武帝时代财政改革成功的原因与启示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六章　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与王莽财政改革的失败 …… （略）
　第一节　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 …… （略）
　第二节　王莽财政改革新“方案”的具体内容 …… （略）
　第三节　从王莽财政改革失败中得到的启示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七章　“光武中兴”和东汉时期的财政经济 …… (略)
第一节　加强皇权，治乱为安 …… (略)
第二节　与民休息，国运中兴 …… (略)
第三节　盛极而衰的历史再现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财政收入 …… (略)
第一节　土地税收入 …… (略)
第二节　人头税收入 …… (略)
第三节　徭役与更赋 …… (略)
第四节　关税及市租收入 …… (略)
第五节　财产税收入 …… (略)
第六节　山海池泽苑囿之税 …… (略)
第七节　专卖、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收入 …… (略)
第八节　卖官鬻爵与赎罪收入 …… (略)
第九节　公田、屯田收入 …… (略)
第十节　贡献与酎金收入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财政支出 …… (略)
第一节　军费（国防）支出 …… (略)
第二节　皇室支出 …… (略)
第三节　官俸支出 …… (略)
第四节　经济建设支出 …… (略)
第五节　行政、外交费用 …… (略)
第六节　宗教祭祀迷信支出 …… (略)
第七节　灾荒赈恤支出 …… (略)
第八节　文化教育支出 …… (略)
本章小结 …… (略)

第十章　秦汉时期的财政管理 …… (略)
第一节　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机构 …… (略)
第二节　预算制度——“上计”制度 …… (略)
第三节　漕运制度 …… (略)
第四节　仓储制度 …… (略)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财政立法 …… (1)
本章小结 …… (1)

第十一章　秦汉时期的财政思想 …… (1)
第一节　李斯的财政思想与主张 …… (1)
第二节　陆贾的理财思想和主张 …… (1)
第三节　贾谊、晁错的理财思想和主张 …… (1)
第四节　董仲舒、司马迁的理财思想与主张 …… (1)
第五节　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主张 …… (1)
第六节　耿寿昌的理财思想和主张 …… (1)
第七节　王莽的理财思想和主张 …… (1)
第八节　刘秀、王符、崔寔的财政思想与主张 …… (1)
本章小结 …… (1)

本书参考资料 …… (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编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

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正经历一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开始跨入封建社会的深刻变革。而随着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里所发生的急剧变革，国家财政形态乃至各项财政制度，亦随之出现许多新变化。

一般说来，战国时期的财政变革，既是春秋时期财政变革的延续与发展，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演化过程。

首先，从政治、军事方面看，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周王室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因地方诸侯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而日渐衰微，代之而起的则是大小诸侯国或新旧势力之间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兼并战争；进入战国后，由大国争霸进而演变为群雄逐鹿、争霸中原的分裂割据局面。但经过“战国七雄”间的长期火并，中国开始由诸侯割据称雄逐步走上全国统一的道路，而周初建立的世袭分封的宗法政治体制，亦最终被秦始皇开创的天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取代。

其次，从经济方面看，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方法的进一步推广，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垦辟私田的不断扩大与分散式的家庭个体小农经济的强化，意味着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鬻”为标志的西周井田制度趋于瓦解，并由此开始出现土地买卖现象。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为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

创造了条件。于是，随着私营煮盐业、冶铁业、漆器业等手工业部门的大量涌现，夏殷以来的“工商食官”传统格局亦随之被打破，而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与繁荣。面对所有这一切深刻变化，作为政治权力和财力再分配重要职能工具的国家财政，无疑将经历一次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巨大变革。其显著标志就是：以奴隶主国家实施的分封授田制度、并按“贡助彻”征收方式维持国用的旧有财政管理制度，因公室衰微、权力下移以及私田垦辟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在承认私田合法地位的基础上，相应采取“食有劳，封有功”、“废井田，开阡陌”的“履亩而税”新型实物财政管理制度。

而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亦变得异常活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就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许多著名的理财思想家，正是通过这种“竞相争鸣，彼此驳难”的论坛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中，有些理财家所提出的某种理财主张或策议，不仅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其合理的“内核”，对后世亦不乏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价值。总之，纵观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尽管内容丰富，复杂多变，但从财政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看，仍是有其一定的内在演化规律可循的。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局势及其发展变化

一、公室衰微和大国霸政迭起

平王东迁以后，宗周故地遂为秦国所有。周所能控制的地域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税源被截留，税基被侵蚀，中央财力在萎缩。此外，周王的直属部队，亦因士兵数量的减少而力量变弱。而诸侯大国的军力却迅猛增强，军队规模亦在急剧扩大。周王的天下共主地位正面临严重挑战。各国的诸侯们不再定期向周天子述职纳贡，有些国君竟僭越周礼，以天子的一套礼仪举办礼乐。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失去纲纪约束的某些诸侯国君，其所制器物，无论数量、质量均已超过王室。至此，有周以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被“自诸侯出”[①] 所取代。随着王室威信的降低与天子大权的削弱，一些诸侯大国便趁势举起周王这面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向外扩张，因而出现大国间的相互争霸以及大国对小国的兼并战争。国势渐强诸侯的相继崛起与霸政局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群雄逐鹿、争霸中原的长期分裂割据道路。

春秋以来，最先成就霸业的是齐桓公。他自执政之日起，便在相臣管仲的辅佐下，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经济，国力不断增强，同时又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联合华夏各国击溃戎、狄的进犯。此后，齐桓公在中原各国中的威信大为提高。周襄王二年（公元前 还剩

① 《论语·季氏》。

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大会诸侯时，除鲁、宋、郑、卫等国派代表加盟外，周天子也派人前往，厚加犒赏，足见齐桓公已成为取代周天子的第一霸主了。桓公死后，因诸子争立，内乱不已，齐国逐渐失去其霸主地位。

正当齐势有所衰退之时，宋襄公曾企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但被楚国所挫败。结果，原加盟齐国的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皆相继转变为楚的盟国。楚在南方获得发展后，不仅控制了黄河流域不少中小国家，而且成为继齐之后决定中原政局的又一重要力量。而在楚称霸中原的同时，晋国勃兴起来，并成为楚的劲敌。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回国即位，他就是晋文公。由于晋文公历经磨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他又学识广博，深孚众望，因此，执政伊始，他便发奋图强，厘革弊政，一面抓生产，一面加强军备，晋国很快就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当时国内呈现的“政平民阜，财用不匮”[①] 的大好局势，充分证明晋国已具备了争霸中原的实力。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晋楚发生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之战，晋国取得了胜利。战后，当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与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会盟时，周天子即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文公死后，其子襄公虽依靠文公时功臣宿将的辅佐，仍能保持晋的霸业。然襄公一死，朝廷大权即旁落于诸卿之手，贵族之间的相互争斗，使晋国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而楚庄王又乘机夺回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晋称霸时，僻处西方的秦国，即有东向争霸中原的企图，只因当时国力不足，东向之路多被晋国所阻，因而只得转向西方，以谋发展。到秦穆公执政时，秦国终于成就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 的大业。自春秋中叶以来，晋国实力虽有所衰退，但由于楚、晋两国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对恃状态，而秦与中原其他各国又均非晋楚两强之对手，加上连年不休的争霸之战，不仅使各国因财力损耗过大而元气大伤，而且还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日趋激化，因此，各国均无力外顾。周简王七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以宋国出面调解晋、楚两国议和休战的首次“弭兵”之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当宋国再次约请晋、楚“弭兵”时，立即得到晋、楚、齐、秦四大国的一致赞同。“弭兵”的出现，尽管无法改变晋楚两强平分霸业的形势，但此后几十年间，诸侯的争霸之战的确比以前大为减少了。公元前 [illegible]年以后发生的吴、越争霸，那只不过是整个春秋霸业的一个尾声。

总之，从春秋初约有 [illegible]多个诸侯国的群起争霸开始，经过以大吞小、以强凌弱的长期兼并征战之后，到春秋末年转变为齐、楚、秦、燕、韩、赵、魏以及晋、吴、越等国相继称雄的政治格局，它足以说明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西周以来的宗法政治统治秩序终于土崩瓦解了。

二、新旧势力的斗争和封建政权的建立

春秋以来的长期兼并战争，若以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晋、楚两强的第二次“弭兵”为界，人们就会不难发现：此前的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大国间的彼此争霸以及大国对小国的兼并；在此之后，其争霸形势已转变为卿大夫的专权和卿大夫之间的相互兼并。可

① 《国语·晋语四》。
② 《史记·秦本纪》。



见，由诸侯争霸和兼并，发展到卿大夫专权和兼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旧势力此长彼消的递嬗更替过程。而以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则正是通过这种新、旧势力的长期较量之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了从专权到“自立为君”的政治统治地位的。

春秋战国之际，势力强大的各国卿大夫，不仅利用奴隶和平民对旧领主贵族的抗争，先后在其封邑内取得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征收赋税的权力；而且还在向诸侯公室进行夺权斗争的同时，积极向外扩张，为争夺财富和劳动力而展开彼此间更为激烈的长期兼并战争。但与春秋时期不同的是，此时的兼并战争，自“三家分晋”之后就已基本上形成了齐、楚、秦、燕、韩、赵、魏“七雄”并立的大国争霸局势。面对这场激烈残酷的兼并之战，七国的新君主为了使自己在未来的争战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先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新举措。而这一改革运动，也就标志着中国开始跨入封建社会。

自春秋中叶以来，随着奴隶和平民反对旧领主贵族斗争的广泛开展，势力强大的各国卿大夫，乘机采取各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加快其夺权的步伐。如鲁昭公五年（公元前 缘范年），即“初税亩”实施 缘范年后，鲁国就出现了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卿大夫“专鲁国政”的“三分公室”事件。这三家正是通过私庇大批“隐民”，招揽贤才等手段，逐渐壮大起来的。至春秋末，鲁的政权实际上已被这三家所把持。而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齐国尤为典型。战国前期，卿大夫田桓子为相，他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收揽民心，针对齐景公厚赋敛、重刑罚的苛政于民的作法，在其封邑内采取收税用小斗、借贷用大斗、偿还时再用小斗的办法，从而提高了田氏的地位，此后，民众“归之如流水”。到齐平公五年（公元前 源缘年）时，田氏子孙终于成为齐国的新君主了。此外，随着晋国霸业的中衰，晋国的新旧势力斗争亦愈加激烈。晋国从献公时起，由于取消了公子、公孙的宗室贵族地位，因此，就使异姓卿大夫势力很快发展起来。春秋中叶以后，晋国也出现了“政在私门”，并由卿大夫“专晋国政”的局面。此后又经过卿大夫之间的争斗与兼并，到春秋末年，则只剩下韩氏、魏氏、赵氏、范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家族，即所谓“六卿”。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 源缘缘年），韩赵魏灭了智氏，瓜分了智氏的领地。次年，晋出公被迫外逃于楚，三家自立为君，晋国君主反倒变成附庸，并转而向他们朝贡。最后，晋国终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

“三家分晋”以后，齐、楚、秦、燕、韩、赵、魏“七雄”并立争霸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①]。尽管以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但旧制度还未被废除，综合国力仍有待增强，可见，要巩固政权并在大国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对旧的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的改革。综观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改革，由于同处在一个竞相争霸的背景之下，因此，无论从改革内容乃至社会效果方面看，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度，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如楚悼王任用吴起主持变法时，曾下令：凡封君子孙已传三代以上者，则一律收回爵禄，对疏远的公族，削除其公族籍。凡无能无用之官，都一并裁退，且削减其俸禄。与此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各国又制定了一些奖励办法。如齐、赵、韩、魏、燕等国，都曾以倡言举荐和下诏求贤的方式广招人才。特别是秦国实行的依军功授田宅的“二十等军爵”制，对秦国日后的强大以及统一中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参见翦伯赞：《秦汉史》第 远页，插图一：“秦与六国形势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愿愿缘年版。

其次，废除分封制，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春秋时期，由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势小国弱，因此，在与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时，只有集权方能有效地打击对方，而郡县制正是适应国君集权需要的一种政权组织。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更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这种制度。当时各国都普遍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商鞅变法时，将全国划分为 [illegible]县，县以下设乡、邑，全面实行编伍制，以 [illegible]家为伍，[illegible]家为什。并制定连坐法，一家犯法，[illegible]家连坐，以加强政治控制，实行君主集权。

此外，重视法治，颁布法典。各国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颠覆活动，就必须制定法律，并加以公布。如韩国有《刑符》、楚国有《宪令》、齐国有《七法》、赵国有《国律》。特别是魏国李悝编纂的《法经》，可称得上是集春秋晚期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进而成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秦律》则是秦国商鞅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的又一部较为完整、严密的刑罚制度，包括《田律》、《仓律》、《军爵律》等三十余种。尽管这些法律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倡行法治，对于成就霸业、实现富国强兵，仍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然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毕竟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改革进程也不尽一致，因此改革效果迥然不同。如楚国自吴起变法以来，国力日渐增强，后曾因一度打败魏国而引起各国震惊。可楚悼王去世以后，宗室贵族便发动武装叛乱，结果导致变法失败，楚国也因此日渐衰落下来。再如燕国，昭王为了继续坚持富国强兵的改革，一方面通过广招人才为其出谋献策，同时又对外联合赵、楚、韩、魏诸国大败齐国，一雪国耻。可是因为国内旧贵族势力依然较强，因而，改革之路就显得异常曲折。相比之下，远落后于东方六国的秦国，虽一直被东方各国所不齿，但外部的强大压力，反而迫使国内有强烈的改革欲望。秦孝公即位后，决心继承献公的强秦事业，任用商鞅，先后两次推行变法。果然，在实施“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以及废除世卿世禄等一系列改革新举措之后，秦国不但成为令“诸侯畏惧”的强国，而且也为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公元前 [illegible]年，秦王嬴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王嬴政重用李斯、尉缭等人，并接受他们的建议，用重金收买六国权臣，破坏六国的抗秦部署，接着又连年发兵东征，将统一六国的大业推向高潮。从秦王嬴政十七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到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illegible]年），秦国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灭掉了韩、魏、楚、燕、赵、齐六国。从此，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终于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

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铁器工具和牛耕技术的使用。我国古代用铁的历史可上溯到商代。[illegible]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表明，那时已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陨铁进行锻打加工并和青铜锻接成器①。春秋初期，齐国已有冶铁业并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管仲曾对桓公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斸，试诸壤土"②。"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illegible]年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镶玉铜柄"铁剑"，经鉴定确系春秋早期以块炼法精制而成的人工冶铁制品。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敬王七年（公元前[illegible]年），晋国用铁铸造了一个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除此之外，铁农具在考古中亦有发现，如山西省侯马北西庄春秋遗址所出土的[illegible]件铁残犁铧③，这足可说明，铁农具在晋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关于牛耕，《国语·晋语》中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记载，它表明曾作为宗庙祭祀贡品的牛，现在已被用来耕田了。这反映春秋后期牛耕的推广和普及。另外，在人的姓名上，牛与耕连在一起使用的现象亦时有所见，如孔子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伯牛名耕，晋国的大力士牛子耕等，说明牛耕在当时已是相当普遍的事物。

由于铁的发现和铁器应用于农业，以及牛耕方法的进一步推广，这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周末春秋初，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以木、石器为主，耕地工具仍以木制的耒耜为多，因此，集体耕作和耦耕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但随着铁农具的应用和牛耕方法的推广，它不仅比耦耕的效率要高出两倍多，而且又可以使大量的荒地被辟为良田。尤其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农作物的产量和剩余农产品也自然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增长。与此同时，铁器的广泛使用，还可使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变为现实。如楚庄王统治时期，曾任用孙叔敖在今安徽一带主持修建了芍陂，可灌溉土地一万余顷。春秋末年，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之后，既便利了江浙地区与北方的水上运输，又使运河两岸收到了灌溉之利。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可喜的进步。如手工业方面，除冶铁和煮盐业之外，在青铜冶铸、陶瓷制造、车船制造、漆器业、玉器业、纺织业、金银饰品业等方面，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加，而且在制作工艺上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时的手工业分民间和官府两种。官府手工业规模较大，民间手工业则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商业与手工业大体相仿，即官营为主，民间交易为副。这种由官府垄断的"工商食官"传统格局，到春秋中叶以后被打破。于是，私营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在一些具有重商传统的齐国、郑国，一直采取支持商人、保护商业的政策，因此，当时的工商业十分发达。有关"弦高犒秦师"的历史记载说明：商人的活动范围不仅越来越广，经营规模日趋扩大，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此外，随着商品交换的增多，为交易提供的固定场所——市，也比以前更加繁荣了，并且成为城市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左传》记载，郑、鲁、齐、宋等国都有市。农村中的小集市亦因交换的下伸而活跃起来，即所谓"因井田而为市"。而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日趋活跃和城市的兴起。这样，随着民间以物易物交换方式的日益减少，一种新型的早期铜质铸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战国时期，是封建经济确立的时代。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因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上，铁农具的使用不仅更加广泛，而且农具种类也日益增多，从考古挖掘资料看，如犁、锄、铲、镰、耙等农具以及刀、锯、凿、锤、斧

① 河北省博物馆等：《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② 《国语·齐语》。

③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载《文物》[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第[illegible]页。

等手工工具，在河北、辽宁、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均有发现（参见图 员原员员和图 员原员圆）。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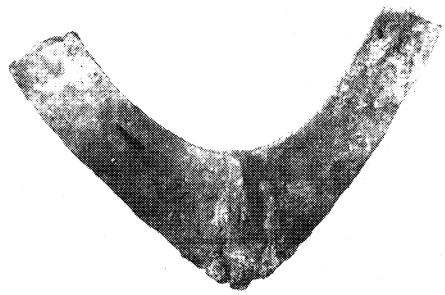


图 员原员员　铁 灾形铧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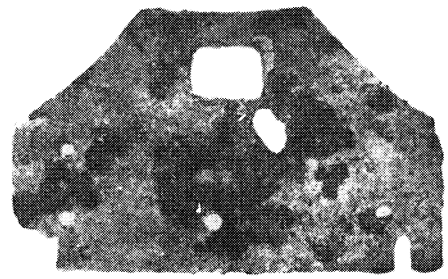


图 员原员圆　铁六角梯形锄

同时，牛耕也得到进一步推广。所有这一切，无疑为扩大垦荒、深耕细作、改良土壤以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农作物品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了预防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各国都非常重视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漳河十二渠、鸿沟等水利灌溉防洪工程（参见图 员原员猿 图 员原员源 图 员原员缘 图 员原员远），就是那时修建的。其次表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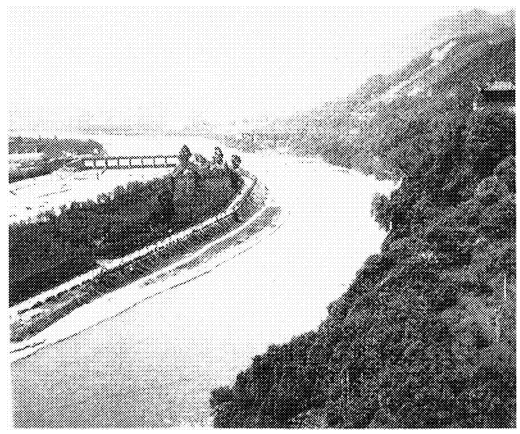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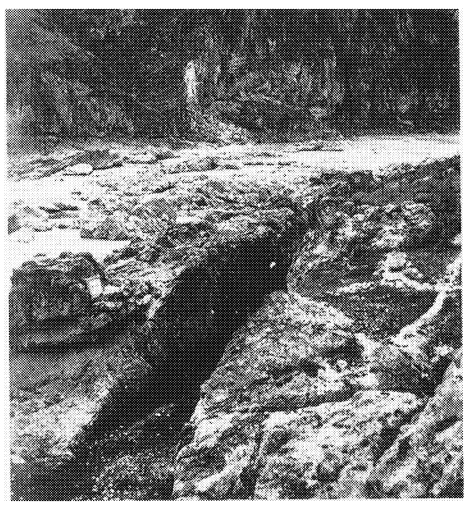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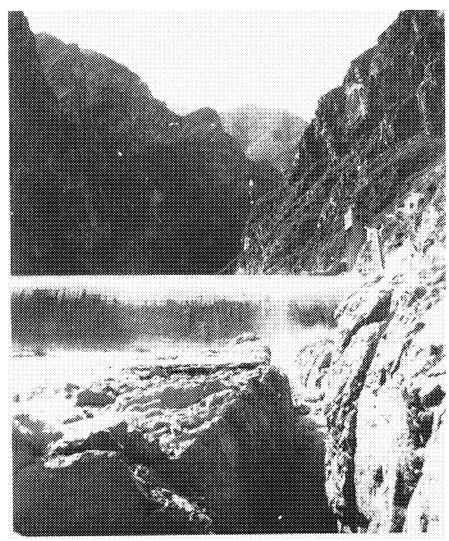


图 员原员猿　都江堰遗址



（之一）



（之二）

图 员原员源　郑国渠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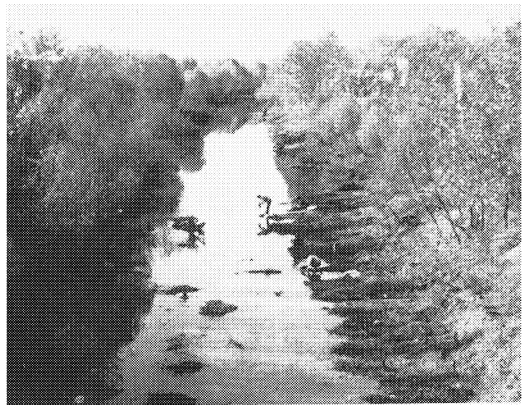


图 员原缘　西门豹渠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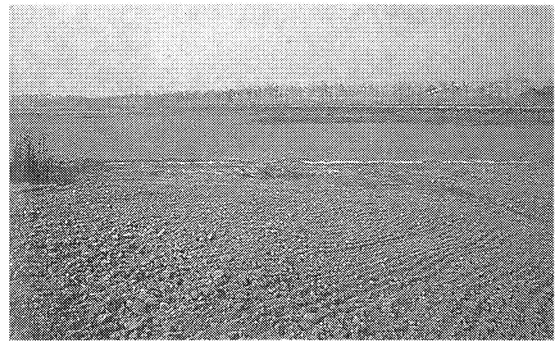


图 员原远　鸿沟古河道遗址

手工业的进步上，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和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时的冶炼业、制陶业、漆器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考古发现表明：战国的冶炼设备已有熔炼炉、鼓风管、皮囊、陶范等。尤其是“高温液体还原”的生铁铸造方法的应用，比欧洲约早 员愿愿员年。此外，纺织、印染、煮盐、竹木、皮革、酿酒、车船制造等业，也有较大发展。再有，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又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商人是最活跃的阶层。那时的商人既有个体小商贩，也有富商大贾。尽管商人有以贱买贵卖和不等价等方式牟取利润的一面，但在互通有无、活跃市场以及分解自然经济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如韩、赵、魏使用的“布币”(参见图 员原苑，齐、燕使用的“刀币”(参见图 员原愿，秦使用的“半两”圆钱等 (参见图 员原怨。与此同时，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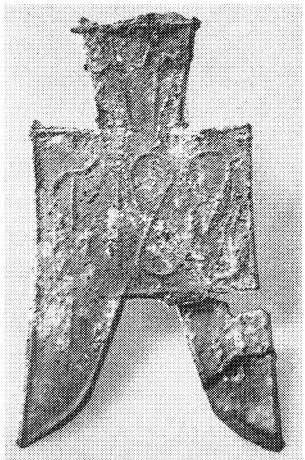


图 员原苑　“兹氏”布



图 员原愿　“齐法化”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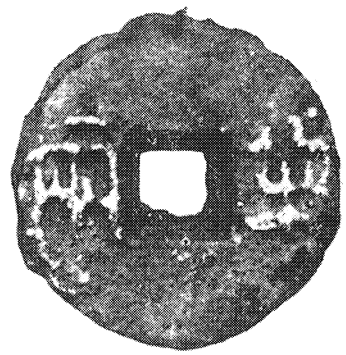


图 员原怨　秦“半两”

趋兴旺与繁荣。史载，战国中叶以来，各大国的都城和著名的城市已达十余座。当时的各国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除此之外，战国时的人口也急剧增加，据估计，当时七国人口总数已在[illegible]万以上。然而，就在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兼并战争也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破坏，因此，随着国家财力损耗的急剧增加，以及统治者对人民赋税盘剥的日益苛重，阶级矛盾也随之不断激化。形势的剧烈变化，迫使各国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财政改革。

二、井田制的崩溃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

如前所述，铁农具的使用与牛耕方法的推广，不仅为开垦荒地和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且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又使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因此，随着私田垦辟的与日俱增，以“十千为耦”、“千耦其耘”集体耕作方式为特征的井田制，便愈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一些中下层奴隶主贵族已不再满足于周天子或上级贵族分配给他们的份田，他们除了把奴隶和平民所开垦的井田以外的大量荒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外，还把井田内的国有土地也视为任凭自己支配的私有土地，或用于赏赐、赔偿，或用于交换等。最初，这些私田不受王室和诸侯的干预，也不纳税，因而发展迅速。而此时，井田制下的生产状况却十分不佳。由于剥削残酷，奴隶们或消极怠工，或结伙逃亡；同时井田之外的私田也吸引大批平民设法逃脱沉重的财政剥夺。《诗经》上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就是公田，“维莠骄骄”则是形容野草丛生的样子。可见，井田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贵族们除招徕劳动力开发私田外，还采用各种手段侵吞公田。当时争田事件不断发生，如周简王六年（公元前[illegible]年），晋大夫郤至与周争郩田；周简王十二年（公元前[illegible]年），晋郤锜夺夷阳五田，晋郤犨与长鱼矫争田；周景王十二年（公元前[illegible]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周景王十七年（公元前[illegible]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而就在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竞相争夺土地的过程中，土地买卖的限制被冲破了，在某些边远地区“土可贾焉”[①]。

[illegible]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岐山发现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宅的主人是西周后期一个叫裘卫的人。刻在这些铜器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变化情况的最好材料。在“卫鼎五年”上，记载邦君厉将四田租给裘卫的事。“卫鼎九年”上，记载了它的主人以一辆车和车马用具，同一个叫矩的人交换一块土地，并用马匹衣服换取这块土地上属于另一个人的林木。“卫盉”上详细记载了他与奴隶主矩伯交换土地的情况。这些铜器的发现，证明西周时转让、出租、买卖土地的现象开始出现，私田问世，这是井田制动摇的一个信号。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当时商业发展的情形时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显然，土地也在买卖之列。如当时赵国大将赵奢之子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②]，即为典型一例。晋国也曾利用戎狄“贵货易土”的特点，用财货交换戎狄的土地。我们知道，井田制是中国奴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分配制度，是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而春秋时期出现的私田和土地买卖的现象，则是同奴隶

① 《左传·襄公四年》，并见《国语·晋语》。

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制完全不相容的封建制的萌芽。尽管当时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制的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但土地关系的私有化、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被破坏，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应运而生。一些中下层奴隶主贵族为了吸引劳动力，将土地租给逃亡的奴隶、平民耕种，如《逸周书·大聚》中载："分地薄敛，农民归之。"春秋早期见于记载的"隐民"、"私属徒"、"宾萌"和"族属"，就是指这种封建依附关系。民和徒在以前都是奴隶的称呼，萌也是用来称呼奴隶的，它们与氓、甿二字通用。但此时的"隐民"、"私属徒"和"宾萌"等却有了新的含义。"宾萌"和后来"愿受一廛而为氓"的含义相同，都是指外来的依附农民。他们为了谋生，投靠于私家，成为私家的徒属。徒属被私家所庇匿，则称为隐民。隐民与私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故而称为私属徒。虽然他们还不是自由人，但身份已不同于奴隶了。在这种剥削方式中，出租土地者已不再是奴隶主，而是封建地主；租种土地者也不同于过去的奴隶平民，而是农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和"卖庸而播耕"[①]的雇农。劳动者身份的改变，标志着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出现，并将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战国时秦国"除井田，民得买卖"，则是此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同时，工商业部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春秋中叶以来，由于官府垄断的"工商食官"传统格局已打破，于是，私营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官府工匠的头人原是贱职，这时像晋国的匠丽氏、鲁国的匠庆氏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匠氏，都参与各国的大事了。如宋国有位手工业者，既有固定的住址和常来的主顾，又有世代相袭的职业。而私商的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一些富商巨贾，他们不但周游列国从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且还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甚至能和诸侯们"分庭抗礼"。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原身份低下并以充当诸侯门下食客为生的"士"人，已很难再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而单独存在了。因此，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动，就使得周天子制定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宗法政治统治秩序必然走向衰落。

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被剥削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表现在财政征收方式的改变上。虽然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但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最终都要通过财政分配关系的变化，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形势的急剧变化，就迫使各国统治者不得不改革财政分配制度，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财力兵力来源。如齐桓公任用管仲实施的"相地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等。各国改革的目的原本是为了维护旧有的奴隶制度，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加速了井田制的崩溃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相继实行的以财政改革为中心的变法运动，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本 章 小 结

周平王（公元前 770 年～前 720 年在位）东迁，共主地位严重削弱。到庄王（公元前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公元前 771 年在位）以后，齐、晋、楚、吴等大国相继称霸，从此，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绝对地位，开始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公室势力在社会进步中日渐衰弱。随着铁器工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对原先的土地分配制度（井田制）提出了挑战；而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产品门类增多，而且工艺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使“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这一切都表明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难以维持，一种崭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在萌芽、成长。而战国时期各大国的改革，农业、水利、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彼此间联系的加强，政治上郡、县制的出现和各国君主的集权，这一切又都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基础。所以说，统一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